

探求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

——评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

李 开

赵振铎著《中国语言学史》是继王力(1981)、何九盈(1985、1995)濮之珍(1987)等著作之后又一力作,从春秋战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43万字的篇幅概括2,500多年的语文学、语言学学术发展史。赵先生出生于小学世家,有深厚的学术功底,1955年9月向高名凯先生辞行请正,高先生教诲说: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去观察中国传统语言学,“必定会有很多发现”。(589页)¹赵著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探求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规律,从中发现新的理论观点,而这些探求和发现,无不与历代语文学、语言学的成果紧密结合,无一空谈。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学?王力认为中国“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范围;何九盈认为“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濮之珍则认为“我国古代语言学史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赵著指出“中国语言学史是指研究中国语言学从古到今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认为“在西方普通语言学传入我国以前,我国语言学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还认为:“中国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导言4页)在语言学史的分期上,赵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的线索更加明确”,分期的确定须“根据语言研究的特点,联系社会历史状况,结合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导言5页)进而把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个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代到“五四”前、“五四”到八十年代。这与王力分为训诂为主(先秦两汉),韵书为主(魏晋到隋唐宋元明),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时期(以乾嘉为主的清代),西学东渐时期(晚清1898至1949),何九盈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以乾嘉为主的清代、晚清1898年至解放前,濮之珍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明代、清代、“五四”至解放后是有区别的。最大区别在于,赵以魏晋到唐五代为系、宋元明为一系、清代到“五四”前为一系。我们注意到,赵的这一分期,与他对中国训诂学史的分期大体一致。赵著《训诂学史略》(1988)就分六个时期,所不同的是,该书第五、第六时期即为清代和现代,以章太炎、黄侃为现代的起点,内容上终止于王力《同源字典》(1982),而《中国语言学史》以“五四”为现代的起点,章、黄列入清代,全书内容终止于徐中舒《甲骨文字典》(1988)。

赵以魏晋至唐五代为一期,完全考虑到通行的做法:书中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这740年分为两个阶段,但强调“这两个阶段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在“文化背景、学术思想等方面却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放在一起讨论”。(126页)学术文化背景的一致成

为分期的标准，这正是试图从接近语言文字学，或者说简直就是从语言文字学本体发展来划定学术史分期。魏晋清谈，涉及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甚至发挥荀子“约定俗成”，经学经历了从两汉今古文之争转入该时期的郑学（今古文合流）王学（王肃，古文经）之争，由郑学占统治地位转向玄学。王弼《周易注》对后世影响很大，杜预《左传注》推倒贾逵、马融、王肃的做法，建立新的注释体系。陆德明《经典释文》把《老子》《庄子》都称为“经典”，是当时学术风尚决定的。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何超《晋书音义》、殷敬顺《列子释文》、张彦《五经文字》乃至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无一不吸取、规摹《经典释文》。唐代最主要的经学和语言文字学书《五经正义》，“也以南北朝义疏为蓝本”。（172页）当然不可能是前代义疏的原貌。应该说，赵先生以魏晋至唐为限，是有道理的。周予同曾认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来自北朝，学术思想来自南学，并认为从汉魏到唐孔颖达，经学上都是汉学系统。蒋伯潜则以六朝至五代之经学为一系，以起于晋代的南方义疏论为唐世正义所本，且认为汉人注经，唐宋人疏注，《十三经》的疏唐人居九，宋人居三。史学家白寿彝则以“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讲论该时期的漕运、军事运输、海上交通、商业、天文历算、水利研究、医药卫生等一脉相承的成就。

把宋元明单独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时期，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宋元与唐代划分为不同时期的依据是什么？赵著也是从学术文化入手的，书中说：“唐代和宋代在学术思想、文化特征上都是有区别的，在语言研究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同。”（240页）二是宋与元明共为一期的依据是什么？赵著同样从学术文化入手，认为宋代理学“影响到元、明及清代”。宋明理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对经书故训敢于提出异议，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各方面都开拓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新的内容”。（240页）唐宋不同期，因宋有影响至巨的理学，这很容易理解。至于在语言文字上的体现，书中处处注意抓住宋代的特点，例如书中说：“宋代的辞书编纂有一些不同于前代的特点。”（240页）再如，宋元明笔记特多，“笔记里面记录的有关语言的论述，有的非常精辟”。（252页）又如，以唐李阳冰刊定《说文》为滥觞，“宋代的《说文》之学空前发展”，（277页）徐铉大徐本《说文》已足以说明。除大徐外，书中还举小徐、吴淑、王安石等十数事以证宋代《说文》学不同于阳冰独步的唐代。又如，这一时期的音韵学以等韵图为体式获得空前发展，又是古音学的开创时期。当然，宋元等韵学是传统的，从明代起，等韵学开始走向近代，但这并不妨碍把宋元明作为一个大的语言学时期。又如，语法的研究，“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实字、虚字的名目”。（324页）宋代“虚词内部的区分已经很细致”，为元代出现《语助》那样专门的虚词著作打下了基础。（331页）如此看来，唐、宋分属，合宋元明为一系是有道理的。

至于清代，书中以西学东渐、文化工程、学术思想、乾嘉朴学、经书新疏、子集总纂等重大成就说明“清代可以看作我国语言学的全面发展时期”。（344页）清代独立为一系与魏晋至唐、宋元明各为一系一样，都是以学术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字学自身的成就和内在发展为依据的，也即是以核心语料和以语言文字学为重心的学术文化主体结构来划分语言学史时段的，一般不涉及非对象本身以外的材料来强作分期理据，这是很可贵的。

二

赵著除了有独到的语言学史分期以外，对语言学史史料的新开拓是其又一特点。传注语言学史料的引用，使赵著获得若干重要创发。许慎《说文叙》提出假借字可追溯到《周

礼·地官·保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明，注释中何时使用“通假字”这个概念？有何用语？赵著说：“东汉解释文字通假才开始使用专门的训诂用语”，而用语不一，“因时、因人，甚至因书而有不同”。最早用术语表通假的，据现有材料看是杜子春（约前30—约58），用语是“读为”和“读如”，杜的学生郑众（？—83）用“读如”较多，郑玄用“读为”、“读如”、“读曰”，高诱用“读曰”、“读如”。“用语不一致也会引起纷惑”，（54页）魏晋南北朝没有解决这种“不一致”问题，直到颜师古注《汉书》才统一使用“读曰”。（54页）而真正使用“通×”来注释通假字是在清代。朱熹《诗集传》仅见一例用“通”字，可以看作是通假字术语。《诗·小雅·桑扈》“彼交匪敖，万福来求”，朱熹集传：“敖、傲通，交际之间无所傲慢……”词类问题，赵说：“两汉的传注里面有些解说的方式很难说和词类的观念没有联系。”例如：西汉初年的《毛传》“～者”、“所～”格式表人名、物名、所做的事，用“所以”表“用来作～”的意思。毛传和郑玄都用“～之”的格式来表示所解释的词有动作行为的意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郑玄和高诱在注释那些本来无动作行为意义的名词、形容词时，一旦用上“～之”格式，立即使它们获得动作行为意义。毛传在注释有被动意义的词时用“见”字。最早用“貌”、“然”注释有性质状态意义的词的也是毛传。毛传还用“辞”注释助词，用“叹辞”注释各种表感叹的词。郑玄在给毛传作笺时，对有些虚词的解释更加明了。有的学者甚至还注意到方言里的虚词，指出它们的方言来源。汉儒传注的词类观念为什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赵著指出，这主要是“传统的语文教育以识字、辨析句读为中心，没有在综合归纳语言规律上多下功夫”。（58页）这是个科学的说明。断句实际上是分析语言结构，连郑众这样的大学者也会搞错。传注中的史料表明，两汉学者在分析语言结构时，已注意到句子成分和词语的省略以及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毛传补《诗》句词语，和用汉代语言解释《诗》“中”字位置，用汉代正常句式解释颠倒了的词序，都和句子结构分析有关，但都没有进一步概括，上升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时代的局限。

对唐代传注史料的开发，集中在梳理孔颖达《五经正义》。义疏体裁始于南北朝，至唐代已成熟。赵著说：孔疏“有不少前人所未涉及的内容”。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尔其勉之，相从为愈”疏已有“语法”一词，它至少是指“语辞使用的规则”。赵说：“把语辞的作用提高到规则的高度来认识，仍然是了不起的贡献”。（174页）孔疏还把词分成两大类：义类和语助类，并以“为义”和“不为义”区分之。这实际上是“后世所说的意义标准”。（176页）义类和语助类，“为义”和“不为义”，实际上大体相当与今天的实词和虚词。从语言结构，从词在上下文中的情况分析词义，确定它是实词还是虚词，“这种方法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作用”。（177页）十分可贵的是，孔疏的“义类”有进一步的内容：用“名”和“称”对举表事物名称；用“方”表作为普通名词的方所；还曾用“动义”二字概括出“一个更广泛、更概括的动作范畴”；（178页）更多地具体解释一个个动作的名称，进一步发挥《公羊传》自动、他动而作对比性解释；表性质状态的词也称为“名”，而用“貌”或“然”解释之；把象声词看作与表性质状况的词属同一“义类”；对数的一定程度的抽象说明和对量“体”的实体名词的说明；把人称代词和其他代词区分为“义类”和“语助类”。赵著说，孔疏“为义”、“全取以制义”的词“包括后世语法学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象声词、数词、量词和人称代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词”。（182页）

孔疏的“语助类”，又称“辞、语辞、语助、助句辞”，这些用语来自汉晋人旧著，但孔疏所包括的内容要比汉晋人广泛得多：涉及了语首、语中、语末助词；解释了连词和介

词；把副词也看作“辞”；把叹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列入语助类；把上古汉语有构词的附加成分或类似附加成分的东西看作“语助”。赵著指出，孔疏语助类的范围“比他以前任何一家要宽泛得多，这是古代虚词研究的一大发展”。（186页）

孔疏对句子也有精彩的论述：论句子的特征；“句”的名称的来历；从孔氏论诗歌文句的长短看其明确的句子观念；揭示同义的联合词组所用的术语有“复语、连言、字重、重言”；论及古书常见表达方式互文见义、变文避复；揭示上古汉语“中”字倒置结构以及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等特有的规则；突破单个词的解释，已在句法范围内讲论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赵著认为：孔疏训诂最多，但从语言学发展史看，“它对语言结构规则的说明更有价值。它几乎涉及到语法的方方面面”。（190页）赵著表明：利用传注研究语言学史大有可为，可以专门另行撰写“传注语言学史”。其实，赵利用的传注史料还很有限，仅就汉唐而言，从毛传到李善《文选注》，名注疏至少也有三、四十部，宋以后就更多了。

利用笔记里的语言学史料是赵著又一特色。类似的体裁和史料，可追溯到颜之推甚至更早。例如，书中引《颜氏家训·书证篇》以见颜氏对文字发展及其应用的看法。（253页）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有关于外来词的论述：外来词与母语词完全是两回事，更不能望文生义。颜在注《汉书》匈奴语词时就贯彻了这一正确见解。（254页）宋代思想解放，笔记极多。许多笔记都记载了南方人“黄、王”读音不分，正可说明上古云母字读成匣母字，隋唐或稍前北方话区分此二纽，但南方话一直“存古”至今，混而不分；《席上腐谈》对方音讹变持开明态度，《癸辛杂识》用文献印证方言，《贡父诗话》已注意闽方言；陈鹄强调首都话在正音中的作用；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一系列闽音，并因此发现一字变会引起一韵之字全变，连最正的洛阳音也不例外，这已是语音演变规律性的认识，比国外早得多。（259页）宋笔记大量涉及当时俗语，《老学庵笔记》等还注重探求俗语词的来源。（264页）关于词语考释，北齐颜之推就写过条目，宋明尤甚，注意点从三代两汉一直延伸到唐。例如《梦溪笔谈》等都考释过“建麾”一词，有七、八种笔记文考释过晋宋文献出现过的“宁馨”和“阿堵”，并“涉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相当中肯”。（270页）考释的方法有：文献对比、参证活的方言俗语、利用当时的社会风习、目验或利用前人观察的成果等。宋明笔记对清人的语言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赵著对笔记的引用还是很有限的。如从《白虎通》算起，直到晚清，至少也有168种，光《梦溪笔谈》，英李约瑟就指出其中的语言学条目就有36条。（高小方1998）赵著启示我们，笔记文是语言学史料的富矿，亟待开采。

三

赵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把中国语言学放在世界语言学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世界语言学的萌芽，中国和古希腊同时，且同样讨论名称问题，接触“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提出的“语言问题”。（12页）先秦诸子哲学中包含的语言学命题最为可观，孔子正名就是“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不仅政治伦理上要正名，日常生活器用之名也要正，孔子“觚不觚”的叹息是一典例。这就找到了孔子对用词要求的普遍性含义。孔子返鲁修《春秋》，在语言运用上，除了“寓褒贬于一字”的严肃性以外，还提出了“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的对立统一，是现代修辞学的起源。孔子论正音和雅言都是指形成中的共同语。（23页）《老子》已讲到“名”的产生，比孔子正名论要深刻。《老子》首章“道可道”等四句话已说明“名生

于道”、“名称与它所表示的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肯定“名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名称与事物的关系”，这些与普通语言学要“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目标一致。古代名家“和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足而三”。《经》已涉及有声语言的发生、传递和接收问题。“以名举实”之“举”已是“用语言表示事物的属性”，“言，出举”就是说“句子是表达思想的”。（16页）“应该是名家的著作”《墨辩》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19页）《墨辩》通名为达，类名为类，专名为私的说法，既是逻辑学的，涉及到谓词叙述主词；也是语言学的，涉及到词的音义关系。事实上，通、专、类名的区分，是《尔雅》十九类、《方言》名分卷而实分类、《说文》540部的逻辑体例的基础。没有先秦名家也就没有后代的名书。荀子著名的“约定俗成”原则，“也就是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21页）荀子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就是指社会，后为《马氏文通》后序所采，称《文通》的作用“将以大群焉”，“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解，不为他群所群”。“名”的分类，荀子较《墨辩》复杂：大共名（犹墨达名，内分单名和兼名）、小共名（犹墨类名，分单兼）、大别名（仍犹墨类名，分单兼）、小别名（犹墨私名，分单兼）。单名是单个字的起名，兼名是两个以上字的起名。荀子四级之名，犹“《尔雅》语词总汇和百科事物名总汇——社会生活类名和自然万物类名，《释鸟》有雉类，《释兽》有鼠类，《释畜》有牛类——释诂、言、训、亲、宫、器等19类——《尔雅》普通语词607条、社会生活专名344条、自然科学专名1,096条。解读古代文献的训诂学，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叔向聘于东周说《诗·昊天有成命》，这比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从事古籍注释和校勘，特别是荷马史诗的整理，比古印度公元前5世纪注释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歌《吠陀》，都还要早。（25页）语法研究完全不同于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尤重句读分析和虚词分析。后者最早见于《墨子》。（30页）至于综合词典的编写，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尔雅》又比古印度的《长寿字库》早得多。（35页）

两汉的古籍注释、辞书编纂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世界的文明古国中也遥居于领先的地位”。（47页）究其原因，一是汉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大量的民间书籍征入国家图书馆以后，整理研究需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二是语言自身的演变，要释读先秦典籍必须研究它的语言。（47页）赵著讲的这两个原因，都紧系语言文字。通常认为，传统语文学是不会涉及理论的，但“汉代学者也有一些对语言一般问题的论述，有的还讲得比较深刻”。例如扬雄《法言》论述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问神篇》还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王充提出了语言发展的观念：“古今言殊，四方谈异。”郑玄亦然，在解说前代文献时也注意到古今语音的不同。（48页）两汉语言学和经学的关系，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大课题，赵著着墨不多，但已讲清了五个要点：一是今古文经本来只是书写文字的不同，没有太大的差别。二是古文经的传本多为战国文字，需要加以解释，该学派的特点就是力求解释准确。三是今文经学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大，东汉末何休《公羊传解诂》也是按古文经办法写的。四是郑玄注群经兼采众说，取舍间能做到“符合语言实际，对于语言研究的发展有不少的推动作用”。五是经学家们注释的非经书典籍，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传注语言“很有好处”。（51页）这五条，条条扣紧语言文字，质朴明晰，本身就是朴学风格。

对扬雄《方言》，赵著以史学家的眼光指出其四大成就：注意到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和地域上的转移，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问题，注意到词的语义差别，提出了“转语”概念。认为“扬雄对语言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有些认识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还居于领先地位”。（69页）还指出国外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调查方言，比扬雄晚了2,000年。

《说文》之研究，名家云集，赵著史见独具者五：从黄侃《说文略说》对《说文》部首内部字排序入手，分析《说文》排序规律；阐释“《说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完善了汉字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说《说文叙》是一篇系统的文字理论著作；在辞书学上的贡献；专论“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许慎的《说文》也应该占重要地位”，作为第一部详解词典，《说文》要比西方早1,500多年。（96页）

关于声训和《释名》，针对一些流行的误解，赵著提出了若干平实之见。从世界词源学考察，古印度、古希腊的词源学成就都不大。（97页）在语言学上有价值的声训，无非三类：用来沟通方言、说明文字通解、推求得名由来。《释名》恰恰就是“全面运用声训这种方式来探索事物得名由来”的书。在阐述“《释名》声训不是毫无可取”时，认为“声训的理论不是荀子‘约定俗成’理论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补充”，理由是：“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可以根据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来给事物命名，可以用同样的语音形式表示相关的事物，这样做就构成了表示新义的新词。于是词的意义发生变化，但是有引申关系，语音有了变化，但是有对应规律，它们构成了语音和意义上有关的词群。刘熙所说的义类大概和它相当。”（106页）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求同源词的理论基础，也是理解“约定俗成”的重要方面，求同源词与“约定俗成”说没有矛盾。

魏晋到五代，佛经翻译中形成的若干主张对今天的翻译工作仍有启发。（136页）梵汉对译中的语音分析对汉语字母的创制有重要意义。（141页）郭璞不拆解联绵词，继承扬雄转语，重视活语言研究，用描写法释名物等，对后代影响极大。陆德明《经典释文》重视正音规范，（161页）用语音变化表示词义或语法关系，对总结语言规律，虽然粗略，但“算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169页）对我们今天研究汉藏语系的某些语言也有启发。（166页）《切韵》音系对确定正音规范有重要作用。（219页）凡此，都是立足于现代语言学进行分析的。至于孔颖达《五经正义》区分实词和虚词，赵著说，西方语言学里的这种二分法，“是受到汉语语言结构研究的影响而形成发展起来”，尽管不一定与孔颖达直接有关，但孔“最早而完整地提出这个看法则应充分肯定”。又说：“美国布龙菲尔德《语言论》里说：‘（汉语）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这种区分法和《五经正义》很接近。看来也很难说不是在什么地方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190页）

宋元明等韵学“在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的对立、互补和分布观念，已有本世纪初西方结构语言学提出的音位的对立和互补、语言要素的分布学说的某些因子，而对颇难索解的等韵门法概括为用“权宜变通的办法来解决”“遇到的一些难题”，（306页）实为一针见血。宋贾昌朝《群经音辩》卷六“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三门第一次汇总四声别义的材料，是“研究汉语形态变化的重要资料”。贾对“声调、声母的清浊区别词义和词性的作用”比陆德明（原书误作“陆法言”）“认识更清楚了”。（329页）朱熹《诗集传》有句子结构的比较，并用出土文物文字研究古籍，“今天也是一个时髦的方法”。（337页）元卢以纬《语助》竟能早于高本汉经研究《左传》发现“於”和“于”的区别，指出二者“微有轻重之别”、“于比於意略重”，卢的功绩“应该载入史册”。（336页）

对清代学者的成就，书中列出专章去发掘清儒的语言观。（371页）主要有：持语言演变具有规律性的观点；探讨语音演变的内部条件——从语音结构本身去探讨语音的变化；语音演变的原因——从发音习惯的变化说明语音改变，由方音向共同语演变的可能性；语音演变的例外——借用。赵著认为，上述语言学上的一般理论问题，江永《古音标准》都

提到了，而其成书不会晚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这就是说提出这些问题比西方早了将近一个世纪”。（372页）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在钱之前有江永“福服今音轻唇，古音重唇”，但囿于三十六字母不可增减，所论只是个别现象；在钱之后，则有雅·格林（J.Grimm1785—1863）的“格林定律”指出的印欧语[p]→[f]演变规则，但“钱大昕的发现比格林要早半个世纪”。（368页）此外，利用活方言证古音、证古无轻唇音，用梵语借词证古音，都是十八世纪用过的先进方法，今天仍不失为好方法。（375页）刘献廷著《新韵谱》，设计方言调查工作，较西方“早了一百多年”。（400页）光绪年间的胡垣注重方言的地方变异、对应规律、材料分析，他对方音的认识已不是仅仅作平面的描写，而是有了历史的探索。（406页）劳乃宣《等韵一得》从前代庞杂的等韵学中摆脱出来，不仅论述实际存在的音，也论述可能存在但尚未发现的音，这些论述使他向一般语音学理论过渡。如果循此发展，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记音工具，扩大语音资料的收集，“即使没有西洋语音学理论的输入，我们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语音体系”。（412页）

从马建忠起语言学渐入近现代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带有现代性，有的已直接引用西学，故赵著以阐述本体为主，不必如从前那样，别具意识地把他们放到世界语言学大背景上去琢磨。例如：《马氏文通》七大词类说，“主要是借用了拉丁语法的概念”，论句读固然是从传统语言学中吸收了两个概念“句”和“读”，但马氏先从析句开始，讨论七大句子成分，进而分析各类句式，为现代的汉语句法学“创立了规模”。（421页）章、黄一方面继承旧学，同时又受西学影响。日本翻译介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对当时亡命日本的章氏“有很大的影响”。《国故论衡》上编后半部分直接引用德国语言学家缪勒《语言科学讲义》，是章氏“接受了普通语言学理论而又结合汉语实际写成的论述语言文字理论的著作”。（444页）以上还是直观用例，而对争议甚多的黄侃古本声十九纽，赵著引用李方桂、黄典诚、赵克刚、郭锡良等现当代学者对十九纽的阐述、检验、和补正，使十九纽原本一时还难以直接显示的现代性得到综合抉发，并认为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在认识上、方法上的改进，“对这个十九纽也会续有补充和修正”。（450页）

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八十年代，赵著更因其自身的现代性而重在本体阐述，并由其汉语语言学的特性看到包含其中的世界语言学成分。例如，30年代后期，我国出版了一批语音学的普及读物，说其本体，“它们都以国外某一种语音学著作作为蓝本，又结合了汉语的情况，深入浅出，能够引人入胜”。（485页）具体评介时则强调被评对象本体的汉语语言学特性，注重从特殊到一般，如评述罗常培《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时详述全书“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外语”用例原则，全书价值首先在于对推广普通话、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有益处，同时对学外语，进一步研究普通语音学“都极有好处”。求其本则全书“应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联系中国语言的具体实际”。（486页）赵先生注重“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科学思想方法在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四

综上所述，独到的分期、对史料的新开拓、注重世界语言学背景上的透视，形成赵著的三大特色。但赵著也有可商补之处。

先秦时期，现在一般都讲先秦诸子和《尔雅》。诸子对《尔雅》、对后代语言文字学有何影响，赵著并没有回答，仿佛先秦诸子语言学说是孤零零的。孔子正名，老子道名，墨

辩、荀子的类名，都离不开名学、名书之名，离不开称名之名。概念和名称的关系，即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从诸子名学到名书《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不过是概念之名的具体化，名称之名的系统纂集。名学中的分类说，直接成了《尔雅》十九类、《方言》明分卷而实分类、《说文》部首分类的基本体例。《荀子》“约定俗成”讲了名称和事物概念之间无联系，实际上还包含“名称与名称之间有联系”，这正是求同源字的依据。诸子名学之名即概念，而诸子名学尤重概念，而较缺乏推理逻辑，甚至可以把名学称之为概念之学。后代名书解释法用不完全推理的推理判断式二元式“A，B也”，《说文》字头排列有序，以概念次序为主，结合形体近同排序。概念排序是一大事，《说文》义序是诸子重在论说概念的名学学说的发展和具体化。如此看来，我们是能够找到先秦名学和后世名书间的联系的。

诸子是文化的早熟，其博大精深的叙述已包含若干语法观念在内，例如《墨经·经上》：“名：达、类、私”、“谓：移、举、加”。这些当然都是讲概念及其组合的。谭戒甫译注：“名词分为达、类、私三种”、“谓词分为移、举、加三种”。谭还针对《经说》文字注释：“‘狗犬’，犹言‘狗是犬’。在此句中，命狗为犬，故曰命谓；犬本是名词，此移作谓词用，故曰移谓。移谓或命谓，今称表词或补足语。举谓，今称自动词，因为吠的动作仅止于狗自己。加谓，今称他动词，因为叱的动作须加在狗的身上，狗是被叱之物，今称受事格，当时未说及。”谭说可参。赵著重视《五经正义》的语法观念，尤重虚词和实词的区分，但诸子不乏语法观念，正如郑莫先生指出的那样，《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已有很明显的语法叙述，但赵著并没有提到诸子和四大名书中的语法观念，这就使后代语法观念的产生失去了源头。又赵著已说《五经正义》未用“实字、虚字”这样的名称，而最早用此名称的，据郑莫先生的说法，似乎最早见于宋代笔记文。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七：“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

此外，本书没有编名目索引，也是一个大缺憾。又全书校对问题还不少，最令人遗憾的是，赵著皇皇达四十余万字，版权页只标了“219千字”。

附注

1 括号内的页码是赵著《中国语言学史》一书中的页码。下同。

参考文献

- 白寿彝 1980 《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小方 1998 《中国语言文字学史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何九盈 1995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蒋伯潜 1983 《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濮之珍 1987 《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力 1981 《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赵振铎 1988 《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
赵振铎 2000 《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郑莫、麦梅翘 1964 《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朱维铮 1996 《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开 南京大学中文系）